

新型全球化与“一带一路” 研究范式的兴起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摘要:随着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日渐取得成效,西方学术界也开始将“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化联系在一起。从西方学术发展的轨迹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出现了讨论权力与全球化之间关联性的努力,特别是深入研究了霸权与全球化特色的关系。与英美主导的全球化不同,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一方面是要超越西方中心的旧全球化,另一方面也是要瞄准共同发展,而不是争夺权力。从中国学术界近6年的研究来看,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在中文文献中,“一带一路”作为一种新的范式,正在替代“丝绸之路”这种来自西方的话语体系,并依托地理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逐步形成新的学科体系。对中国来说,要成为新型的大国,就要进一步以“一带一路”为抓手,主动积极开放,并注重知识创新。

关键词:霸权;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研究范式;知识创新

中图分类号:D0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9)06-0078-15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19.06.012

“一带一路”是过去6年中国快速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下一阶段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从2018年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有关论述来看,“一带一路”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引领全球化的一项标志性倡议。2018年8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中指出三个要点:第一,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中国的开放新格局;第二,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第三,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下一阶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基本要求^[1]。上述三点内容正是本文标题所阐述的,也标志着经过5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正在迈向第二个阶段。2018年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会议时进一步指出:“经过5年努力,共建‘一带一路’正进入深入发展新阶段。”^[2]2018年12月2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讲话中,习近

平又进一步概括指出,中国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同各方一道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3]。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旨演讲中进一步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4]。

从政策议程上看,“一带一路”毫无疑问是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并且将继续起到引领作用。鉴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中国致力于在2050年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强国,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可以说,随着中国发展壮大为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国内政策不可避免带有国际效应。特别是“一带一路”从提出伊始,就旨在推动全球治理、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难免产生不可预料的地缘政治动力和结果。尽管中国人也关注着这种影响力,但是国际社会从外部观察中国的行动时,则更加关注大国崛起带来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对于一直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这样一个

收稿日期:2019-08-26

作者简介: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外直接投资,东亚与美国。

发展中国家站起来呼吁推动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在全球化的悠长历史中并没有一个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起到主导性作用。西方国家熟悉的历史是霸权引领下的全球化发展历史,主要分为英国霸权阶段和美国霸权阶段。因此,立足于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欧美国家在关注“一带一路”时不可避免地要与权力、国际博弈等联系在一起,而且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其关注点也略有差异,本文第一部分将对此进行分析。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显然需要研究改革开放、全球化以及“一带一路”对于中国地位的影响,不仅要研究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也必须纳入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影响。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究和认识才逐步展开,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构成了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发展表明,参与全球化已经不是一种政策选择,而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全球化已经有几百年了,中国曾经与之失之交臂,也曾受过全球化的苦难,对于这一段历史进程,也需要加以深入讨论,为什么一个曾经的文明古国会失去参与全球化的机遇,这到底是基于自身的闭关锁国这种战略判断失误,还是源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制?长期以来,这是中国社会辩论的主题。随着中国重新成长为世界性大国,我们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丰富的历史经验来审视和再考察。

另一方面,中国多年的经验和英美等国目前的情况也表明,全球化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说在冷战时代,参与全球经济受到各种政治约束,那么现在对于各国来说,包括欧美等发达国家,真正的挑战在于怎样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调整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毫无疑问,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中国式全球化已经构成全球发展的共同知识,也成为其他国家下一阶段参与全球化时不可忽视的背景。也就是说,中国要研究中国式全球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真正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研究中国政策的效果。这个其他国家,既包括曾经参与主导全球化的发达国家,也包括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式全球化——在实践上是“一带一路”,在理念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能给自己带来好处,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利,那么这种全球化必然很难获得支持,甚至其

命运也不如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推动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说,中国学术界有着更紧迫的压力去研究中国式全球化的利弊。当然中国政府的主张是通过“三共”——共商、共建、共享——来获得更加公正和均衡的结果,但这种主张能否在实践中实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业务部门的操作。

本文的论述将涉及到上述内容和目标,从目前积累的文献来看,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在若干方面不同于欧美曾经主导的范式。与此同时,这种学术范式的转变也将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越来越重视“三高”——高质量、高标准和高水平——的标杆意义,这对于中国和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一、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与全球化关系的研究

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初,国际社会想当然地从崛起国的角度来了解这一复杂的倡议,并尝试将它类比为二战结束后美国推动欧洲经济振兴的“马歇尔计划”。显然,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和苏联阵营早期的重要一方,中国对冷战时期的话语十分熟悉,在进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中国对任何试图重新回到冷战状态的解读都十分警惕。因此,当国际社会试图用一种地缘政治竞争的话语分析“一带一路”时,无疑没有抓住中国提出这一倡议的动力和目标。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发表重要演讲,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从拥抱全球化的角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一带一路”建设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此后,尽管国际社会仍有一些人士研判和揣测“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经济含义,但倾向于从新一轮全球化的角度来认识“一带一路”积极意义的文献也在不断增多。这些文献表明,实践进展在不断推动人们改变对“一带一路”的认知。

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所(NBR)于2017年6月出版了《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的政治与战略启示》一书,这是美国学术界和智库第一本关于“一带一路”的专著。作者纳德基·罗兰德(Nadege Rolland)是法国人,懂中文,采访了不少中国相关人士,她认为欧美智库、商业协会以及政府机构从2016年初开始对“一带一路”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并不系统,也不深入,西方世界应该深入系统地研究“一带一路”。在罗兰德看来,“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战略关注点

的转移,从美国转向欧亚大陆,并试图以一种并不那么直接的方式与美国争夺地区影响力,是中国锤炼全球角色的一项试验。为此,西方民主国家要做好准备,捍卫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5]。该书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较大反响。有的评论认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风格的全球化”^[6]。2017年6月,美国智库CSIS提出,西方应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中国距离全球秩序的领导者地位还非常遥远,但是中国试图以新的方式与全球连接起来,并且准备在“全球化2.0”中扮演积极角色^[7]。

2018年8月,加州大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不仅意味着美国将丧失全球领导力,而且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塑国际体系的机会,其中中国的影响力将显著提升。所谓“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一方面与传统的出口导向依旧有联系,但另一方面,中国将更加倚重于双边和地区经贸协定,而不是多边协定。而且,在知识产权、外资流入以及金融体系方面,中国引领的全球经济将更具限制性^[8]。

2017年8月,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长马克林(Colin P. Mackerras)认为,在西方逐渐从全球化撤退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为基础的全球化(China-based Globalization)的象征^[9]。

2017年10月,菲律宾学者认为,如果说“一带一路”的国内意义主要在于推进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的话,那么其对外的含义在于聚焦下一个阶段的全球化。就下一个阶段的全球化而言,尽管不会出现一个像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那样的“领导者”,但全球化也必然需要一个重心。随着世界舆论越来越多提及“一带一路”,那么将自动地赋予“一带一路”以特定的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内涵,不可避免影响贸易、金融联系、基础设施引领的发展以及全球治理的特征。总的来说,中国关于多极全球治理的观点将显著得以提升,民主规范的重要性将下降,外部因素对主权的挑战也将减弱^[10]。

2018年4月,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一带一路”是“中国风格的全球化”。中国将为参与国家提供互利共赢的成果,但同时中国也将获得地缘政治影响力^[11]。2018年10月,随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成功访华,中日双方达成第三方合作框

架以及签署50个基础设施建设协定,“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再次得到证明。

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峰会之际,波兰科学院学者安纳斯塔斯·万戈力(Anastas Vangeli)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寻求全球主导地位的一种手段。这一概念带有显著的中国特色,是一种增量、引导性的和带有试验主义特性的倡议。“一带一路”并非是一个单一的项目,尽管起步阶段它主要围绕亚洲、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但随着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一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倡议,其规模是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7倍。中国决策者从本国的改革开放中寻求力量来源,国家将成为最为重要的推动居民富裕的力量,而市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工具。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国家新自由主义(state neoliberalism)”,以区别于西方倡导的“市场新自由主义”。作为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工具,“一带一路”能否建成还取决于中国与欧盟以及印度的关系^[12]。

俄罗斯也出现了一种将“一带一路”视作中国特色全球化的声音。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刊物于2018年初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一带一路:全球化的中国方式?》。该文认为,包容性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它能否将发展中国家带入工业化,并减少全球不平等。中国引领的工业化已经改变了全球许多产业的面貌,而这将成为新阶段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13]。

2017年5月,在北京举办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之际,中国官方和智库学者的一个重要共识是,“一带一路”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中国将主动推进更富公正、包容和普惠特色的新型全球化。201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的一组文稿认为,“一带一路”是“新型全球化的新长征”^[14]。同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蓝迪国际智库项目专家委员会主席赵白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引领人类的第四次全球化——新型全球化^[15]。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辜胜阻认为,“一带一路”是新型全球化的重大引擎^[16]。2017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在《求是》发表《“一带一路”开创包容联动共享的新型全球化》,他认为“一带一路”从理念到实践正在扬弃传统全球化,其方向

不是单向度而是包容性全球化,特点不是资本全球化而是实体经济全球化,路径不是规则导向而是发展导向的全球化,目标不是竞争型而是共享型的全球化,从而开创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17]。在2017年6月发表的学术论文《“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中,笔者也认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推动以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全球化。而且,从战略角度论述了崛起的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有可能会与美国产生冲突,但这种类型的冲突也是可以化解和转移的^[18]。

二、英美霸权与两次全球化

国际学术界的一项共识认为,全球化一词最核心的含义是经济一体化,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就此含义而言,当前我们所使用的“全球化”一词,最早是哈佛商学院教授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1983年5月号《哈佛商业评论》上的《市场的全球化》中加以使用。莱维特判断,在技术进一步推动下,标准化消费产品的全球市场即将形成^[19]。随后西方世界对全球化的研究进展相当快。到了冷战结束初期,大量刊物开始刊出以“全球化”为题的文献,例如1993年《印第安纳全球法律研究》创刊号刊发的《法律的全球化》一文认为,“我们如今站在美国公共法研究史的分水岭关口”。时隔25年后,杂志专门组织了一期专刊讨论全球化对未来25年美国法律研究的影响^[20]。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有关全球化研究迅猛发展的情形,非常类似于2014年以来中文世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例如,最近有德国与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学者合作写了一本《史前时期的全球化》,通过案例研究古代世界的社会和文化的关联性,在此意义上全球化表示的是不同地区之间联系的深化^[21]。还有的学者甚至用“红色全球化”概括斯大林时期到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将冷战解读为全球经济塑造的经济斗争^[22]。传统观点认为苏联代表了一个平行于自由世界经济的另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但作者认为,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苏联也不可避免地卷入

了全球性经济力量,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起,也受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影响。因此,将冷战描述为超级大国在两极世界中的博弈是不完整的,苏联远不是世界中的经济强大力量,苏联只是向富裕世界提供能源,依赖于能源,是南方国家的次优合作伙伴。

西方世界的精英推动全球化,但其他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中下层却并不感到全球化有利于他们。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发展中国家学术界发现,全球化研究本身并非是全球性的,大部分有关全球化的研究集中在经合组织国家,而不是由发展中国家完成的。原因之一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特色的这一轮全球化,但并非完全适合发展中国家^[23]。面对世界性的反全球化运动,2003年初,花旗集团负责人、后来担任IMF总裁的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在著名的“理查德·伊利讲座”中阐述了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但其总体结论仍然是:融入全球经济是一国取得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全球增长主要由工业化国家决定,工业化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对未来全球经济是至关重要的^①。显然,这个观点在今天尤其适用,因为发达国家正在退出或者说重组全球化,由此带来了世界经济规则和格局的变化,发达国家的力量尽管有所下降,但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其GDP仍占世界总额的60%左右。

在这篇重要的演讲中,费希尔还提到了一些对理解全球化和“一带一路”颇为有用的数据。据悉,《纽约时报》在20世纪70年代的报道中从未用过“全球化”一词,到了80年代出现频率也低于每周一次,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每周出现的频率也不足2次,90年代后半期不足每周3次。进入新世纪以后,全球化这个词才迅猛增多。有关全球化的学理性研究也在新世纪以后逐渐丰富和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才新发明的词,但是也可以用来研究历史上的事件,事实上大量的文献所涉及的年代早就越过20世纪80年代,回溯的时间甚至超过数百年。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一带一路”,尽管“一带一路”是2014年以后才有的一个新词,但就其互联互通的本意来看,与全球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人

① Stanley Fischer, "Globalization and Its Challeng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One Hundred Fif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January 3-5, 2003 (May, 2003), pp. 1-30. 费希尔在进行这场演讲之前,曾于1988-1990年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1994-2001年间担任IMF副总裁,在此之后更是担任过以色列央行行长、美联储副主席,其观点也代表了西方世界的主流观点。

们也可以用“一带一路”,或者说“一带一路”精神来重新讨论历史的发展动力。

(一)霸权与全球化的起点

尽管对全球化的非议从未间断,但相关研究却一直在深化。一方面,经济史学者追踪各国、各个区域展开交流的历史,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之间相互依赖加深的现象与历史上的状态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了历史上发生若干次“全球化”的结论。

世界史学者、世界体系论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历史非常久远。在2002年发表的《全球化何时开始?》一文中,出生于1935年的经济史学家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及其合作者给出了颇具代表性的世界史学界的论述,比如全球史学者冈德·弗兰克、杰里·本特利等认为全球化起源于哥伦布的大航海时代。最近也有两位荷兰学者认为,全球化起源于1500年。在《全球化的起源:世界贸易与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一书中,荷兰学者认为全球性交换网络起源于15世纪后期,特别是哥伦布航海和达加马时期。船只、人、金钱和商品的全球流动已经越来越显著,生产和分配对人口、福利和国家形成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24]。

而与弗兰克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如世界体系论学者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则认为全球化要早于1500年。在1989年出版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珍妮特认为远在1350年之前的一百年也可以算作是全球化,从中国到欧洲西北部存在着国际性的贸易经济,其基础是“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25]。珍妮特并没有试图将这个百年的国际经济联系水平,与16世纪甚至17世纪的全球经济联系水平相提并论,她强调的是通过核心区联系起来的跨洲际贸易。当时这个世界体系有3到4个核心区,第一个是占据战略性区位的中东,第二个是蒙古占领的中亚,当时已被并入中国,第三个是印度洋,第四个勉强算作核心区的是西欧的一些城市。在这一时期,核心的原因是元朝将中亚纳入元朝版图,而且中国商船控制了印度洋。导致这一体系奔溃的主要原因是1330年前后欧洲爆发的黑死病,不仅让贸易沿线城市人口锐减,而且导致蒙古骑兵战斗力下降,最终引发了农民起义。明朝建立之后,中亚脱离了中国的版图,进一步摧毁了这一体系。珍妮特甚至认为,明朝逐渐退出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失去了南海的贸易港口,最终导致这一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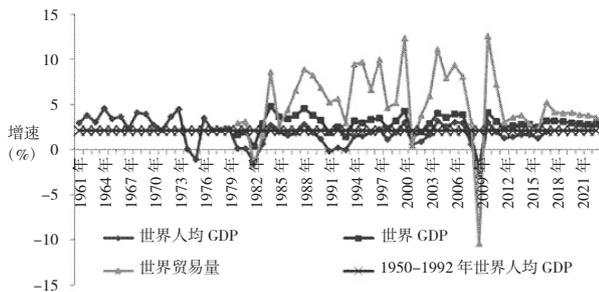
彻底瓦解^[26]。1991年,中国年轻学者张来仪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发表了《蒙古帝国与丝绸之路的复兴》一文,认为蒙古在其征服地区广泛修建道路和桥梁,设立驿站,保护商路,确保了东西方交通畅行无阻,有利于商业贸易繁荣发展。他进而认为,“蒙古帝国时期,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超过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特别是蒙古帝国时期丝绸之路的复兴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27]

将全球化的起点界定在1820年,而不是1500年甚至更早,是威廉姆森及其合作者最富影响力的观点之一,与世界史学者坚持认为全球化可以追溯更远不同,威廉姆森运用价格趋同这一视角,得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是一个19世纪以来的现象。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全球化并非始于5000年前,甚至500年前。它是从19世纪开始的。就此而言,它是非常现代的一个现象。”^[28]威廉姆森所定义的全球化的特点在于商品贸易价格趋同,而不是很多学者使用的贸易量占GDP比重,这一视角使其研究独具特色,并且有助于区别其他经济史的研究。威廉姆森认为1820-1914年是第一次全球化时期,二战以来则属于第二次全球化时期。而且,威廉姆森认为,第一次全球化等同于“英国治下的和平”,第二次则主要缘于美国的领导^[29]。尽管珍妮特与威廉姆森在全球化的水平上有不同观点,但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承认霸权与世界性经济的关联性。这一结论对理解当前的全球经济颇有助益,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经常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待“一带一路”。

与世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不同,经济学家偏向于认为全球化的起步是19世纪的现象,而且越是新生代学者,越倾向于将全球化界定为19世纪后半期的现象。出生于1954年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在2000年的一篇重要文献《全球化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中,依据麦迪森整理的世界人均GDP增速,认为历史上有过两次较为长期的全球化,第一次大约是1870-1914年间的44年,第二次是1950年迄今(2000年)。在第一次全球化中,世界人均GDP增速为年均1.3%;第二次全球化时期,1950-1992年的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速达到2.1%。在此之间的1913-1950年间,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速为0.9%。在第一次全球化之前的1820-1870年间,世界人均GDP增速为0.6%^[30]。

萨克斯还认为,人均GDP增速快的时期也是全

球贸易增速最快的一个阶段。威廉姆森后来也采用人均GDP增速作为判断全球化水平的标准,其原始数据同样来自于麦迪森。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威廉姆森所定义的第一个百年中,1820-1870年间人均GDP增速超过1%的主要是西欧国家和英语系国家,只有到了1870-1913年这个阶段,外围国家未加权的人均GDP才接近于1%,其中拉美、东亚(不包括中国)以及欧洲外围地区都高于1%^{[31]B-7}。因此,总体而言,19世纪后半段到20世纪初期界定为第一次全球化更准确一些。进一步而言,只要世界人均GDP增速高于1%就可以定义为全球化,在地区层面同样也可以采用1%作为研判全球化门槛的标准。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8;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图1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人均GDP、
世界GDP与贸易增速

如图1所示,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世界人均GDP增速总体上呈下降态势。1961-1992年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速为2.1%,1992-2007年世界人均GDP增速为1.8%,2008-2017年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速为1.2%。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速低于1950-1992年的平均水平,采用萨克斯设定的全球化时期人均GDP增速标准,那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化水平比第一次全球化时期还低0.1个百分点,仅比1913-1950年间高出0.3个百分点。不言而喻,如果说我们仍处在全球化时期,那么目前阶段的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当然,如果不计入2009年世界人均GDP负增长情况,那么2010-2017年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速仍可以达到1.8%,为冷战结束以来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平均水平。

新的情况是贸易增速大幅度下降,1984-2007年间,世界贸易量增速年均接近6.9%;而2008-2018年间,世界贸易量年均增速为3.4%,大约为前一个时期的一半。1984-2007年间,世界GDP年均增速略高于

3.2%,2008-2017年间,世界GDP年均增速只有2.3%。不过,威廉姆森整理的历史数据表明,在1913年前的60年中,世界贸易年均增速也只有3.8%,而发达国家GDP年均增速为2.4%^{[31]B}。因此,与第一次全球化相比,2008年以来的全球化不算太差。按照IMF预测,2018-2023年间,世界GDP年均增速预计为2.9%。鉴于2009年世界GDP增速为-2.0%,其他年份都是正增长,从统计上剔除这一年的特殊情况,那么整体上2008-2017年世界GDP增速可达到2.8%,比前一个时期低0.4个百分点。因此,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发展的确进入一个低速期,但贸易增速略低于19世纪后期的第一次全球化,而GDP增速却高于第一次全球化时期。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球化时期,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对此,无论是费希尔还是萨克斯,都是这样的表述。萨克斯的成长阶段与第二次全球化的发展完全契合,本硕博都在哈佛大学完成,28岁即成为哈佛大学的正教授,是冷战结束后将新自由主义理念移植到东欧的“休克疗法”的主要创建者,曾被发达国家寄予厚望。在《全球化与经济发展的模式》这篇代表性文献中,萨克斯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作为他讨论不同国家收益或者受困于全球化的思想线索,并构建一个分析各国面对全球化时不同命运的框架:国家政策、地缘政治以及国家的地理状况。萨克斯区分5种类型的发展模式:内生型增长、追赶型增长、资源依赖型增长、马尔萨斯型衰落以及经济孤立等。其基本结论是,全球化并不能保证发展中国家都能获得快速经济增长。各国的增长还深受地理情况、自然资源以及劳动技能、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对追赶型国家而言,需要得到大量的外部资金的支持。总之,各国要根据本国的发展类型制定政策。

(二)全球化的动力与结果

另一方面,对最近一轮全球化,则根据积累起来的数据,对全球化的动力及其结果展开更多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不同学科、立场的学者对全球化的看法也有较大差异。威廉姆森认为,在第一次全球化时期,运输成本等贸易壁垒的下降对贸易增长起到最主要的推进作用,1820年以来的第一个百年全球化,推进世界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所有因素中,交通成本下降可以占2/3,尤其是1870年以来的40年中则几乎是100%;在第二个时期则主要是收入增加导致^[32]。简

单来说,当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运输成本等涉及到地理的物理性成本下降发挥最重要的作用,而当收入进一步提高时,收入本身将成为贸易增长的最重要动力。这一点对于我们研判“一带一路”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GDP较低,事实上相当于19世纪的西方国家,因此如果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目前阶段最为重要的应当是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也即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从理论上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地理因素是决定性的,而在发展的高级阶段,技术和制度因素更为关键^[33]。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在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而不是贸易投资是否自由化便利化的问题。为此,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互联互通,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水平。而20世纪80年代初发达国家推动的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其核心内容事实上主要只是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超级发展,但我们也看到,这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早就受到强烈质疑。之所以如此,在于这种以金融为核心的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得长期支撑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美国梦”破碎。长期以来,美国阶层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富差距将随着经济增长而最终缩小,每个美国人通过自我奋斗都可以获得理想生活。但是,现有研究证实美国梦已经褪色,那种认为下一代必然胜过前一代的期望在美国基本消失了^[34]。长期以来,世界舆论被美国精英阶层的宣传所迷惑,看到的都是美国的繁荣景象,但却不注意美国社会中下层的生活。实际上美国一些地区已经是破败不堪,美国文化也呈现出社会溃败的迹象^[35]。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谁将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国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数学者认为第一次全球化和第二次全球化均有一个领导性国家。如果要继续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那么有没有一个国家扮演领导角色可能依然是个重要问题。威廉姆森对第一个全球化世纪的研究表明,西欧当时之所以扮演领导角色,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均GDP增速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由此导致19世纪成为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分化加速的一个时期。1820-1870年间,中心国家的人均GDP增速为1.04%,而外围国家只有0.19%;1870-1913年间,中心国家的人均GDP增速为1.15%,

而外围国家提高至0.92%。尤其令中国人惊异的是,1820-1913年这百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的人均GDP增速为0.08%,不包括中国的东亚增速则可以达到0.73%。尤其是后半段,两种情况下的人均GDP增速分别为0.35%和1.23%^{[31]6-7}。由此可见,在第一次全球化时期,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者,原因之一在于被甩出了全球化。

如表1所示,1992-2017年间,全世界唯有发展中亚洲缩小了与北美的差距。1992年,发展中亚洲的人均GDP为850美元,相当于北美的3.9%;2017年,发展中亚洲的人均GDP为5529美元,相当于北美的12.6%。受益于发展中亚洲的崛起,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占北美的比重从1992年的4.4%提升到2017年的8.9%。但与第一全球化时期相比,发展中世界与发达世界的差距被显著扩大了。按照威廉姆森的计算,1700年之前,外围国家人均GDP仅相当于中心国家的56%,1820年外围国家占西欧的比重为50.4%,其中东亚国家人均GDP相当于西欧的48.7%。到了第一次全球化结束的1913年,外围国家人均GDP占西欧的29.0%,其中东亚人均GDP占西欧的17.5%,如果不计算中国,那么占比将上升至34.4%。到1940年,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其人均GDP占西欧的比重上升至51.5%,而整个外围国家占西欧的比重只是上升至34.7%^{[31]4-5}。显然,在这个阶段东亚之所以缩小与西欧的差距,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崛起。

表1 世界人均GDP增长及其表现,1992-2017年

	人均GDP (美元)		年增长率 (%)			相对于发达北美 的人均GDP(%)	
	1992年	2017年	1992- 2010年	2010- 2015年	2012- 2017年	1992年	2017年
世界	4685	10656	1.46	1.51	1.56	18.9	18.4
发达经济体	21926	43956	1.48	1.16	1.55	88.6	75.8
发达北美	24754	57973	1.64	1.40	1.46	100	100
发达欧洲	18182	35009	1.53	0.81	1.67	73.5	60.4
发展中经济体	1082	5159	3.58	3.50	2.96	4.4	8.9
发展中亚洲	850	5529	5.09	4.91	4.68	3.9	12.6
发展中非洲	854	1787	1.43	0.76	0.32	3.4	3.1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UNCTAD数据库整理。

对比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今天发展中世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相当大,但进入21世纪之后已经继续朝着缩小的方向前进。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发达国家推动的全球化,至少带动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局部意义上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不是过去所讲的导致发展中国家更落后。这一点对于历史上的拉丁美洲来说可能更具对比意义。1820年,拉美人均GDP相当于西欧的57.3%,属于当时差距最小的地区,到了1940年,差距扩大到42.6%,经过120年两次全球化的发展,拉丁美洲与西欧的差距被扩大了近15个百分点。就此而言,在20世纪结束后不久,拉美学者从资本主义体系角度研究拉美的落后有强烈的历史因缘,对于拉美学者来说,依附论所描绘的是他们地区经历的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抽象。

对当前发达的北美国家来说,作为一个整体,尽管只是被亚洲发展中国家缩小了发展差距,但是与历史上发达国家人均GDP只是外围国家的两倍相比,仍处于比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西欧更有利的地位。显然,美国的一些精英群体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迅速扩大。1913-1940年间,外围国家与西欧的人均GDP缩小了大约2个百分点,1992-2017年间发展中经济体与北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差距缩小了4.5个百分点,而在此期间发达的欧洲与北美的人均GDP差距扩大了13.1个百分点。

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不会是造成最近这一次全球化退缩的主要原因,最大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的内部。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例如,美国学者艾肯格林等主编并于2009年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力》一书认为,20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世纪,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来说是个黄金时代,包括收入上升、相对可取的工资结构以及工作安全的保障。但是,紧随其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情况显著恶化。经济活动的快速全球化导致工人工作的不安全。对此,该书提供了理解这些趋势性转变的四种解释:(1)新技术的快速发展;(2)商业和劳动力的全球竞争;(3)产业的去管制化,更多依赖于市场;(4)工人的移民增加,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工人^[36]。

传统上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主要挑战者来

自非西方国家,但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等事实却表明,当前国际秩序的调整主要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造成的。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一向坚持自由国际主义学说的伊肯伯里也开始接受上述观点,并且承认二战后支撑自由国际秩序的联盟被削弱,原因在于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所导致的政治极化、贫富差距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面临着严峻的经济不平等和经济发展机会停滞。在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由国际主义不再是稳定和团结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国际主义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动力。伊肯伯里的这篇论文受到高度关注,自2018年初发表以来被下载了近7400次,超过3.6万人阅读了这篇文章^[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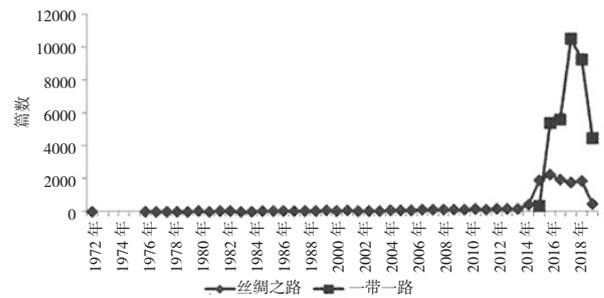
三、中国学术界研究“一带一路”范式的兴起

2013年秋季,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第一次提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38]。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将两个倡议合在一起表达。2014年6月5日,在北京举行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会议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将带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点,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39]。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一次使用简化的“一带一路”来表述两大倡议。

用“一带一路”替换“丝绸之路经济带”或者“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也有很大影响,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观念和视野上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范式性的转变。自2014年以后,如图2所示,学者开始普遍使用“一带一路”,而不是2013年以及2014年上半年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或者“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表述。截至2019年8月初,中国知网(CNKI)中以“丝绸之路”为篇名的文献共有12763篇,而以“一带一路”为篇名的文献多达35508篇。从CNKI可以进一步获知,“丝绸之路”的表述最早是1971年就有的^[40]。1978年《国外社会科学》

杂志翻译了日本早稻田大学丝绸之路研究专家长泽和俊关于日本学术界研究“丝绸之路”的概况,该文认为,丝绸之路研究在日本属于历史学中的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在古代是以草原为中心的,到了中世纪则是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近代则是以海路为中心。长泽和俊还特意强调,战后日本复活“丝绸之路”,是因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是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41]。1980年2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广播协会联合拍摄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完工,引起了世界的巨大反响,该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包括陕西、甘肃、内蒙古和新疆,以及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等六国^[42]。1984年8-9月,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首次就“海上丝绸之路”刊发了一组10篇文章^[43]。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不断有学者提出要“重开丝绸之路”、“振兴现代丝绸之路”、“开辟空中丝绸之路”和发现“草原丝绸之路”^[44]。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的复兴也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的产物。

如图2所示,CNKI发表的“丝绸之路”为篇名的文献,在20世纪80年代每年平均保持在15篇左右,20世纪90年代上升至年均约45篇,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是年均约100篇。2013年突然增加至400篇,到了2014年更是爆发至约1900篇。同样,“一带一路”这样的新名词在学术界的使用也是最近的事情,2014年约有350篇,2015年即增长至约5400篇,一年增长十多倍。显然,在任何一种学科中,要使文献达到如此规模的增长,单纯依靠学者个人的研究无法实现,这种迅猛而高速增长依托于国家战略支撑,反过来说只要国家战略决定性往“一带一路”方向走,那么研究“一带一路”的文献规模仍将是大量的。自2014年6月开始,随着中国政府在公开文件中使用“一带一路”表述,学术界也很快转而使用“一带一路”,2015年中国知网发表的以“一带一路”为标题的文献超过了以“丝绸之路”为标题的文献。2017年,前者的文献数量更是后者的近6倍。不过,图2也表明,“一带一路”研究正在转入一个新的阶段,证据之一是2018年的研究篇数已经要比2017年下降了约1200篇。从增速来看,2019年的相关研究也难以超过2018年的9200篇。这既是对前一阶段热度的消化,也是对下一阶段深化研究的一种准备。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CNKI)。

图2 “一带一路”范式的兴起

截至2019年8月初,在清华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一带一路”为主题查询,结果显示75143条信息。其中,2013年只有2篇,2017年文章数量最多达到22919篇,占总量的30.5%,2018年下降为19394篇,占总量的25.8%。在过去十几年中,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概念和现象引起过这么广泛的关注,调动了这么多的国内和国际行为体。显然,这种快速兴起背后难以避免会出现一些泡沫,但是“一带一路”研究兴起已经是一个需要进行分析的现象。2015年3月,在亚洲博鳌论坛举行之际,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标志着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进入规划落实阶段。截至2019年8月初,该文件在CNKI的被引用次数达到91次^[45]。

CNKI数据还表明,有关“一带一路”研究性文献中,被引用数量超过90次的共有90篇。这90篇文献的总被引用次数超过15000次,总下载率超过100万次。从发表时间看,4篇发表于2013年以前,3篇发表于2013年,23篇发表于2014年,47篇发表于2015年,11篇发表于2016年,2篇发表于2017年。从图2发展趋势看,一定程度上,这90篇文献代表了2018年转折之前中国学术界对“一带一路”研究的成果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点。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很多文献最近的引用量有显著提升,也体现研究关注点变化。因此,本文用下载率再进行筛选,因下载率高表明文章本身属于高度关注的内容。截至2019年8月初,在中国知网下载率中超过10000次的文献一共有34篇。立足于这些样本,从国际关系学科的视角,可以试着分析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是否出现了某种范式性的转变。

表2 中国学者研究“一带一路”的代表性文献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被引	下载
1	“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	刘卫东	地理科学进展	752	75308
2	“丝绸之路经济带”: 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	胡鞍钢 马伟 鄢一龙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26	16115
3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分析	袁新涛	理论月刊	493	47774
4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	申现杰 肖金成	宏观经济研究	478	38488
5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	邹嘉龄 刘春腊 尹国庆 唐志鹏	地理科学进展	426	46847
6	“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	周谷平 阚阅	教育研究	346	18798
7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谭秀杰 周茂荣	国际贸易问题	344	13198
8	“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	孔庆峰 董虹蔚	国际贸易问题	312	17174
9	“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	李晓 李俊久	世界经济与政治	291	45881
10	“一带一路”: 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金玲	国际问题研究	259	40751
11	“一带一路”: 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	杜德斌 马亚华	地理研究	243	31548
1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	郑蕾 刘志高	地理科学进展	220	15075
13	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	韩永辉 罗晓斐 邹建华	世界经济研究	218	11406
14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林民旺	世界经济与政治	151	18874
15	为什么是中国? ——“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	卢锋 李昕 李双双 姜志霄 张杰平	国际经济评论	148	19390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被引	下载
16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定位的三个问题	储殷 高远	国际经济评论	178	27305
17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障碍与对策	何茂春 张冀兵 张雅芃 田斌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73	21538
18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	公丕萍 宋周莺 刘卫东	地理科学进展	173	11027
19	“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	刘慧 叶尔肯·吾扎提 王成龙	地理科学进展	172	28361
20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	黄河	世界经济与政治	160	12660
21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国际经济效应研究——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陈虹 杨成玉	国际贸易问题	156	10031
22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背景、潜在挑战和未来走势	王海运 赵常庆 李建民 孙壮志 A.B. 奥斯特洛夫斯基	欧亚经济	152	12554
23	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	马建英	世界经济与政治	139	11701
24	一带一路战略区电子商务新常态模式探索	王娟娟 秦炜	中国流通经济	135	10486
25	“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挑战与中国的选择	刘海泉	太平洋学报	133	10190
26	“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经贸格局重构	李丹 崔日明	经济学家	126	11639
27	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	王达	东北亚论坛	124	14566
28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及对策	谭畅	中国流通经济	115	11116
29	构建“一带一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李向阳	国际经济评论	113	11039
30	“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合作中的大国因素及应对策略	杨晨曦	新视野	112	10637
31	我国西南地区在“一带一路”开放战略中的优势及定位	张军	经济纵横	111	11272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被引	下载
32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	廖 萌	经济纵横	106	10479
33	“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	林乐芬 王少楠	世界经济与政治	104	13951
34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面对的外交风险	薛力	国际经济评论	95	1210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整理,数据截至2019年8月初。

上述34篇文献的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分布在全国11个省市。其中北京共有18位,占34篇的近53%。其余基本在沿海省份。这一分布的特性体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政治学博士获得者一般聚集在华盛顿,而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分布性较为广泛。以此类推推断,中国“一带一路”研究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研究,其学科属性更接近于政治学和国际问题研究,而不是经济学。以北京来看,第一作者单位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及隶属于该所的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一共5篇。

从34篇文献发表的刊物来看,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地理学会主办的综合性地理学月刊《地理科学进展》发表5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发表5篇、《国际经济评论》发表4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的《国际贸易问题》3篇,其余17篇分别发表在不同刊物上。从机构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在推进“一带一路”研究方面扮演了引领性角色。从刊物所属学科来看,地理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最为突出的两个学科。

依据被引用和下载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缩小样本文章,选择更具典型性和影响力的文献。34篇文献的平均被引用次数为227次,平均下载率为20679次。表2中满足这两个标准之一的文章共有7篇。其中,只有2篇发表在传统的国际问题研究刊物上,分别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金玲发表在本院刊物《国际问题研究》上的《“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46],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李晓和李俊久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47]。而其余5篇代表性文献发表的刊物已经超出国际问题研究传统范式的范畴,其中,《地

理科学进展》属于地理学,在中国的学术分类中属于理科,而不是社会科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和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理论月刊》都是综合性学术刊物,而不是专业性刊物。《宏观经济研究》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主办的专业性学术经济理论刊物。因此,从上述7篇文献发表的刊物来看,按照国家社科基金定义的一级学科,那么包括了国际问题研究、经济学等两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另外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划定的地理学。

引用率超过500次的两篇文献,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的刘卫东撰写的《“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清华大学胡鞍钢领衔撰写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48]。但从被引用率上看,刘卫东的文章影响更大,占34篇总被引用率的10.4%,而胡鞍钢等人的文章被下载率显著低于这34篇的平均水平。但从题目看,这两篇文章的学科定位并非一目了然,而且都属于对“一带一路”内涵的界定。事实上,这两篇文章之所以引用率这么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目前多数人的困惑,即“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刘卫东在2015年发表的这篇重要文献中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包含着诸多地理学命题;或者说,“一带一路”本身就是典型的地理学命题。从地缘政治到国别地理,从运输的空间组织到贸易的空间差异,从尺度间关联到地区间联系,从区域影响到空间结构,从资源环境基础到治理结构差异,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关注的科学问题。正因如此,地理学者从这个倡议提出开始就积极参与有关研究工作,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支撑。2017年北京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之后,相关各方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有所变化。按照论坛签署的联合公报,“一带一路”被定义为推动各国实现开放、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在刘卫东出版于2017年9月的专著中,“一带一路”的精髓被总结为“包容性全球化”^[49]。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是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全球化,也就是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反对的全球化。

胡鞍钢等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一文中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当代经贸合作升级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从消极性战略防御到主动性战略进取、从单一性边疆安全到多维度安全

合作以及从内政外交相分离到内政外交一体化等三大特征。显然,这样一种表述既有传统国际研究学科的底色,但又有所不同。这种情形与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传播路径几乎是一样的。

“一带一路”的显著特征是基础设施建设,国际社会围绕这个有很大争论,争论背后反映出规则和知识体系的差别。与20世纪80年代因石油美元回流美国,继而美国银行贷款给拉美,并引发拉美债务危机不同,这次的逻辑是在中国兴起背景下展开的竞争。因此,硬件的基础设施问题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关系学科兴起之后,几乎所有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对这项内容缺乏理论性分析,只有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有一些分析。二战后,对基础设施的分析曾经在发展经济学中有过一些成果。到现在为止,有关基础设施建设最富影响力的研究是亚洲开发银行做出的。在有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方面,两份亚行报告被广泛引用。尤其2017年的一份报告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新要求,将所需资金额度提高了,认为2016-2030年间,发展中亚洲需要26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当于每年1.7万亿美元,这既是对“一带一路”的肯定,同时也将基础设施建设再度提到国际前沿^[50]。

在学理上,基础设施建设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造成几个大的挑战。第一,西方主流理论不重视规模经济,并且不肯定重大政府规划合法性。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新贸易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开始将规模经济纳入主流经济学框架,但是似乎没有进入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国内研究领域。一个原因是,大部分西方理论成型的时候,或者说大规模开始生成的时候,西方社会已经度过了以铁路、电力发展等为核心的工业革命阶段。在新古典范式兴起之后,涉及到基础设施的研究似乎不再是主流讨论的范畴。

基础设施建设在学理上涉及到的第二个挑战是,西方传统上认识经济项目是否可行,建立在收益和成本分析基础上,但是西方认为用成本收益分析无法解释中国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西方的标

准,中国企业进入的国家是高风险国家。而且,由于从经济上无法理解这些项目,西方不得不讨论中国政府的地缘政治动机。也就是说,西方认为中国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不符合经济理性的假设。如果坚持西方的标准,那么对中国项目建设的批评就是合理的。但是,从中国与西方舆论近些年的争论来看,似乎也不是这么简单,中国坚持认为项目是可持续的。从一些调研来看,基础设施领域的很多中国企业目前处于国际领先,中国企业设定的标准就应该是国际标准。但是,实际上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中流行的判断标准还是西方的,无论是合理性还是合法性,都是西方说了算。在这背后,实际上是一系列关于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如何评估项目合理性、如何评估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等规则的争论,但规则背后更为根本的是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创新国际研究的思想、方法和标准^①。

中国在推动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时,愿意与这些国家分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看法。国家治理能力是一国经济政治能力的最高表现之一,是统筹贯彻发展意志的制度保障。西方以一种分离的姿态看待发展阶段与治理的关系,在贷款融资机构中硬性规定民主、金融市场开放等不符合当地发展的一些要求。中国并不是简单按照西方社会的判断,来评估沿线国家能否实施项目或者合作,而是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经历,抓住时机和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先行先试。这些经验对于推进“一带一路”是很有帮助的,比如“六大经济走廊”、工业园区以及一批重大项目,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四、开放合作与知识创新是中国迈向全球性大国的主要动力

在20世纪的百年历程中,人类既有繁荣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但也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此后虽然发达国家建立多边和开放的世界经济,但是其他国家不是被人为地隔离在开放经济之外,就是被限制在冷战格局中。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抱全球化,一起加入发展经济的大浪潮

^①作为发展领域公认的顶级研究机构,世界银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表明了创新的迫切性。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系列被广泛引用的研究报告和工作论文,如Mauro Boffa, "Trade Linkages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Econom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8423, May 2018,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460281525178627774/pdf/WPS8423.pdf>; World Bank,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9

中。

在解释最近这一轮中国崛起及其影响时,中国和国外的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的理论性分析。有的认为,中国将重蹈西方大国崛起的路径,即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可持续,将最终与美国这个守成大国产生重大的冲突。2018年3月以来的中美贸易纷争一定程度上成了这种观点的证据。但是,中国政府反复表明,中国仍试图与美国进行谈判,将继续维护中美关系的发展大局。而且,中美贸易战也远不是争霸战,中美仍然是有限的冲突与合作^[1]。有的理论认为,中国有无可能恢复传统中国的模式,即在周边地区建立新型朝贡秩序或者类似于古代南亚地区的曼荼罗模式呢?因为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实力地位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基于实力原则中国将重新主导地区发展。但是,对比印度在南亚的中心地位,我们可以想象中国距离这一超级主导地位仍相当遥远。自20世纪40年代末印度独立以来,印度人口占南亚的75%,GDP的80%,军事上5倍于其他国家的组合。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不可能获得这种地位,更不可能在亚洲获得这种地位。因此,中国很难恢复做一个“中央之国”,中国领导人对此也不会感兴趣。

在规则、制度以及舆论上,世界形势不能再简单化为中国VS美西方。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西方舆论突出宣扬西方的胜利,世界的发展就是非西方世界往西方靠拢。冷战结束快30年了,世界不仅没有西化,而且西方本身还分裂了。从我们对全球一些地区的调研来看,至少在原苏联地区,其规则、信念以及知识体系上,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中国的。因此,我们无法仅从英文文献,特别是英文媒体报道中获取对中国有用的信息。而当地媒体在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时也有很大的局限。“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期中国推动共同发展的伟大事业,国外对此有一些疑虑是自然的。中国人在解释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时,一种方法是回到古代的丝绸之路话语体系,以共同的历史记忆重构当代国家间的身份认同。从国际舆论的倾向性来看,西方世界将中国的这个倡议与历史上英美等国向外扩张时的行为与理论相提并论。在此过程中有三种典型思维:第一种是

传统的地缘政治论,第二种是“新殖民主义论”,第三种是西方发展经验重复论。当前的世界舆论正处于转型阶段,不乏中国引领舆论的时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应充分注意上述思维的顽固性及其负面影响,倡导一种不受西方固化思维约束的姿态^①。

从中国人的视角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这次知识革命的重要一员。目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参与的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前两次我们实际上都没有太多的介入,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当时还是中华民国时期,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我们还没有进行改革开放。目前这次挑战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全球化,美国精英传统上重视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产生重大危机,达到了二战以来没有过的程度。在中美关系上,美国认为中国搭便车,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美国出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有关系。我们发现,尽管中国政府做了很多解释性工作,但中美之间仍然有很多无法调和的矛盾正逐步涌现,很多人判断这并非是从特朗普政府才出现的现象,而且,短期内也不会有很大的转变。中美之间以及美国内部的认识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反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原来掌握美国对外政策的是精英层,精英层的逻辑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逻辑有很大的类似之处。精英掌握政权,以捍卫国家利益的名义使用了美国整个国家的力量。美国的财富分配被金融精英阶层控制,金融阶层的控制也离不开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由财富占比下降和收入分配引发的问题已经是笼罩西方社会,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人物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美国需要进行大规模和大范围的知识创新,对现在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新的解释,才能进一步出台符合实际的决策。

传统的知识和认知框架不灵了,也可以说“知识失灵”是继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后的又一个重大现象。所谓“知识失灵”,主要是指传统的认知框架落后于实践,需要进行范式性的转变。目前,似乎正在出现一种全球范围的知识体系的重大调整。我们强调西方霸权衰落,主要是指除了经济之外,在软实力方面的影响力大规模下降,包括美国现政府对国际秩序的承诺,对主流国际经济理论,特别是自由贸易

^①可参考笔者发表在《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的《“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以及2017年5月14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网的文章, http://www.cssn.cn/jjx/jjx_gzf/201705/t20170514_3517739.shtml。

理论的否定等。而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短期内大规模的“一带一路”研究的兴起,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种知识体系转变的速度和迫切性。当然,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讨论是围绕中国的发展模式的,国际学术界正在重新讨论中国发展的动力和前景,而“一带一路”是伴随着这一现象产生,且正在迅速兴起的一种研究共同体,也是中国政府所讲的代表着全球共同发展的方向。

[责任编辑 马 艳]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EB/OL]. 新华网,2018年8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8/27/c_1123336562.htm.
- [2]习近平.把握时代机遇 共谋亚太繁荣——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EB/OL].新华网,2018年11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1/18/c_1123730304.htm.
- [3]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8年12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2/18/c_1123872025.htm.
- [4]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新华网,2019年4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4/26/c_1124420187.htm.
- [5]Nadege Rolland, China's Eurasian Century? Politics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 Seattle, WA, and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7, pp.187—188.
- [6]Shanthi Kalathi, Globalization Chinese-Style: A Jod Book Review, October 16, 2017 [EB/OL]. https://www.ned.org/globalization-chinese-style-a-journal-of-democracy-book-review/.
- [7]Jonathan E. Hillman, Should the West Heed Chinas siren Call for 'Globalization 2.0'? June 1, 2017 [EB/OL]. https://reconnectingasia.csis.org/analysis/entries/should-west-heed-chinas-siren-call-globalization-20/.
- [8]Barry Eichengreen, Glob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ug 10, 2018 [EB/OL].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ization-chinese-characteristics-by-barry-eichengreen-2018-08.
- [9]Colin P. Mackerras, The Belt and Road to China-based Globalization, 31 August 2017 [EB/OL].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7/08/31/the-belt-and-road-to-china-based-globalisation/.
- [10]Alek Chang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October 31, 2017 [EB/OL].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0/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nd-the-future-of-globalization/.
- [11]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ization, China Style, April 2018 [EB/OL]. https://www.nomuraconnects.com/focused-thinking-posts/the-belt-and-road-initiative-globalisation-china-style/.
- [12]Anastas Vangeli, Is China the Potential Driver of a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27 May, 2017 [EB/OL]. https://thewire.in/world/china-potential-globalisation.
- [13]Chubarov L., and Kalashnikov 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ization Chinese Way? Mirovay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2018, Vol.62, No.1, pp25—33 [EB/OL]. https://www.imemo.ru/en/jour/meimo/index.php?page_id=685&id=8407&jid=8396&jj=49.
- [14]王伟光.“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的新长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15]赵白鸽.“一带一路”引领新型全球化[N].人民日报,2017-05-09(05).
- [16]辜胜阻.“一带一路”是新型全球化重大引擎[EB/OL].人民网理论频道,2017年5月1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517/c148980-29281645.html.
- [17]王义桅.“一带一路”开创包容联动共享的新型全球化[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年5月16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516/c40531-29279172.html.
- [18]钟飞腾.“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J].外交评论,2017(03).
- [19]Theodore Levitt, 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 1983 [EB/OL]. https://hbr.org/1983/05/the-globalization-of-markets.
- [20]Matin Shapiro, The Globalization of Law [J].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1, No.1, Symposium: The Globalization of Law, Politics, and Markets: Implications for Domestic Law Reform [J]. (Fall), 1993, pp. 37—64; Alfred C. Aman, Jr., Introduction: Globalization: The Next 25 Years [J].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25, No.2 (2018), pp.565—567.
- [21]Nicole Boivin and Michael D. Frachetti, Globalization in Prehistory: Contact, Exchang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2]Oscar Sanchez-Sibony, Red Globaliz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viet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23]James H. Mittelman, Globalization: Captors and Captive [J].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1, No.6, Capturing Global

- lization (Dec., 2000), pp.917-929.
- [24]Pim de Zwart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The Origins of Globalization: World Trade in the Mak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1500 - 1800*[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25]Janet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转引自 Kevin H. O'Rourke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When Did Globalization Begin?* [M].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6, 2002, p.24.
- [26]Janet Abu-Lughod, *Restructing the Premodern World—System* [J].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 13, No. 2 (Spring, 1990), pp.273-286.
- [27]张来仪. 蒙古帝国与丝绸之路的复兴[J]. *甘肃社会科学*, 1991(6).
- [28]Kevin H. O'Rourke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When Did Globalization Begin?* [J].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6, 2002, p.47.
- [29]Jeffrey G. Williamson, *Winners and Losers over Two Centuries of Globalization*, in UNU-WIDER ed., *Wider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2005, pp.136-174.
- [30]Jeffrey D. Sachs, *Globalization and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Bd. 136, H.4 (2000), p.579.
- [31][美]杰弗瑞·G. 威廉姆森. 贸易与贫穷——第三世界何时落后[M]. 符大海, 张莹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32]Jeffrey G. Williamson, *Winners and Losers over Two Centuries of Globalization*[M]. p.140.
- [33]罗金峰, 文一. 地理、制度与人均收入: 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考察[J]. *经济学报*, 2014(2).
- [34]Raj Chetty et al., *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J]. *Science*, 2017.
- [35][美]J.D. 万斯. 乡下人的悲歌[M]. 刘晓同, 庄逸抒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该书所描绘的美国中下层景象值得研究全球化的人关注.
- [36]Clair Brown, Barry J. Eichengreen and Michael Reich, eds. *Labor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7]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 1, 2018, pp. 7-23. 相关数据来自该刊物所在的数据库.
- [38]习近平. 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M]//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39]习近平. 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M]//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4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 “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J]. *文物*, 1972(3).
- [41]长泽和俊. “丝绸之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国外社会科学*, 1978(5).
- [42]裴玉章. 从《丝绸之路》谈日本系列电视片的制作[J]. *新闻大学*, 1981(1).
- [43]陈炎. 《海上丝绸之路》(一). “丝绸之路”由陆地转向海洋[J]. *瞭望周刊*, 1984(36).
- [44]郭洪纪. 关于重开丝绸之路的探讨[J]. *青海社会科学*, 1986(3); 开辟欧亚大陆桥振兴现代丝绸之路——陇海—兰新经济研究促进会成立大会暨发展战略讨论会简述[J]. *开发研究*, 1987(2); 单元庄, 王欣, 朱俊宏. 开辟“空中丝绸之路”——振兴西部经济与航空工业的战略设想[J]. *人文杂志*, 1991(2); 王兆麟. 架设“空中丝绸之路”——加速西北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思路[J].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1991(8); 卢明辉. “草原丝绸之路”——亚欧大陆草原通道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J].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 1993(3).
- [45]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N]. *人民日报*, 2015-03-29(4).
- [46]金玲. “一带一路”: 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5(1).
- [47]李晓, 李俊久. “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10).
- [48]刘卫东. “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5); 胡鞍钢, 马伟, 鄢一龙. “丝绸之路经济带”: 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2).
- [49]刘卫东. 一带一路: 引领包容性全球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50]Asian Development Bank, *Meeting Asia's Infrastructure Needs*, Mandaluyong City[Z].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7.
- [51]钟飞腾. 超越霸权之争: 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J]. *外交评论*, 2018(6).

New Typ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Emerging Paradigm of the Belt and Road Research

Zhong Feite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